

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欧阳晓

内容提要: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具有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和劳动生产率偏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高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经济分权、对外开放、创新驱动的大国发展道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对这条道路进行了实践探索和理论阐释,可以说在理论分析中是符合逻辑的,在实践应用中被证明是成功的,它对世界上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

关键词:大国道路 中国经验 经济分权 创新驱动

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既有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大国特征,又有劳动生产率偏低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特征。中国古代曾经有过经济繁荣的辉煌历史,但在近代逐步走向衰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的富强之路。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 60 多年的历史,从 1952 年至 1978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两倍,劳动生产率增长 58%,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 1978 年至 2011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22.48 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9.89%,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从低收入穷国迈进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开启了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航程。中国的发展历程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初步形成了“中国道路”的框架。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招待会上指出:“我们自己的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开辟出来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使这条康庄大道越走越宽阔,并为发展中大国从贫穷走向富强提供可选择的典范。

一、中国道路研究的基本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在持续时间和速度上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国奇迹”,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和总结“中国奇迹”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概念。20世纪 70 年代,海外学者开始关注新中国发展道路问题;90 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者讨论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问题;进入 21 世纪以后,海外学者用“北京共识”的概念称谓“中国模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

1. 中国道路的存在性及其意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更

* 欧阳晓,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410081,电子邮箱:ouyangyao008@163.com。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大国经济开放的中国方案研究”(18VSJ0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现要素供需均衡的大国经济模型与实证研究”(71573083)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多的学者认为用“中国道路”比“中国模式”更为科学和准确。“中国模式”主要是描述性的概念，对它的基本内涵和体系结构没有形成完整而统一的认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式的发展道路（王丹莉，2012）。主要有几种具体观点：第一种是将“中国模式”当作可以同“美国模式”相抗衡的模式。有的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遭遇挫折，“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管理经济的问题上，一个新的‘北京共识’将替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华盛顿共识’”（唐晓，2010）。库珀·雷默（Coop Ramo）认为“北京共识”显示了对于“华盛顿共识”的一种对抗，因为中国已经成功地通过鼓励创新、提高生活品质、经济成长以及提供平等的环境以避免社会动乱，并维护独立和自决的地位，拒绝西方强权施加的意志而获得发展上的成功。第二种认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范例，甚至是一种现代化道路。拉莫（Rameau）指出：“中国已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点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独立”（唐晓，2010）。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使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也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发展道路。第三种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而且发展过程中存在巨大缺陷，因而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推广和输出的。詹姆斯·曼认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规模和庞大市场的诱惑力，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比拟”（唐晓，2010）。由于中国发展具有特殊性，而且仍然充满矛盾，因此，中国的发展和富强道路不能从任何其他国家照搬。

2. 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和特征研究。一些学者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具体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特征。主要有几种意见：第一种认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就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道路。詹姆斯·曼提出：“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道路（唐晓，2010）。斯蒂芬·马克思认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它所带来的理念不仅不同于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从而动摇了西方经验以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周弘（2009）指出：“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摆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跳出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第二种认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利用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林毅夫等（2014）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它的经济就会富有竞争力，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按照比较优势选择发展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华民（2007）提出，比较优势竞争就是在不改变现有禀赋结构的基础上，发挥本国充裕要素的成本优势来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密集，但人力资本短缺、技术创新效率低、创新体系不健全，所以需要继续坚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竞争策略。第三种认为“中国模式”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吴敬琏（2014）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高指标、高积累和低效率的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后仍然把数量扩张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各级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企业微观经济决策的干预权力；由于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增长的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权威主义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张平、赵志君（2007）认为从传统的赶超经济模式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期望通过干预要素价格而增加供给和创造需求，很容易形成同质化的低成本产能扩张的供给结构；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使制造业逐步确立了全球竞争优势，但它具有显著的低成本竞争特征。张军（2005）提出，从增长模式看，中国的追赶型经济属于“高投资—高增长”的助推类型；从贸易策略看，是遵循外向原则并依赖技术引进实现技术进步；从工业化战略看，主要是依赖比较优势逐步升级产业结构。

3. 中国道路的制度安排和特征研究。有的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主要围绕政府与市场、经济分权和渐进式改革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巴瑞·诺顿指出，对中国经验的普遍认识，其核心是坚信政府退出市场是经济成功增长的关键，但事

实上是维持对经济核心部门的控制,同时实现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王新颖,2011)。林毅夫(2013)认为中国道路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应该因势利导促进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竞争优势,同时为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吴敬琏(2016)分析了中国改革的历程,认为中国从20世纪末期建立“双轨制”以后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最终选择了第一条道路。第二是经济分权改革模式。陆铭等(2008)认为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激励,推动了地方政府的竞争。姚洋(2011)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是分权,财政分权迫使地方政府依靠当地力量创收,以支付政府人员工资,同时为老百姓提供公共品。郑永年(2016)提出,政府间分权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央和地方都有发展经济的动力,地方政府增加了操纵的资源,对中央和地方来说是一种双赢格局。第三是渐进式改革模式。刘霞辉等(2008)指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可以选择“激进式”或“渐进式”的转轨模式,中国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渐进式改革方略,可以视为中国改革道路的一个重要独特之处,它与复杂的国情和改革的艰巨性相适应,很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姚洋(2012)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在时间上表现为每项改革都是分阶段进行的,没有一步到位;在空间上表现为改革的推进带有地域性,先试点再全面推广。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认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深植于中国传统,也就是在整体主义传统的“亚洲价值观”框架下渐进发展,它没有毁坏改革前的所有成就,从而脱离保持低度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整体主义制度(王新颖,2011)。

显然,国内外学者比较集中地分析了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意义和内涵,并着重从发展战略和制度体制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为此,本文将选择新的研究视角:一是鉴于中国发展尚未形成定型的模式,体制机制和发展战略方面仍然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所以着重于总结和概括建国以来的发展经验;二是中国道路是包含着复杂内容的巨系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所以着重从经济学角度总结和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三是基于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具有超大规模特征,所以着重总结和概括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经验。总体思路是首先基于中国经验提出大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框架,然后阐述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二、中国道路的经验分析框架

中国道路是由毛泽东开创的、在不同发展阶段得到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它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诸多要素。在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构成中国道路的实践基础。笔者认为,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发展问题的核心是经济问题,基于这两个特点,试图从发展经济学和国家规模的视角,对中国道路的基本经验进行分析。

1. 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寻求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大国的初始条件是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大国的国内需求很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国民消费需求的总量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大,因而不可能主要依靠外部的供给,而只能以内部要素和产品的供给来满足消费和投资需求。可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符合大国的国情和大国经济的发展规律,这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主席历来主张,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他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时写道:“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①他强调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自己的情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况，走中国工业化道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出发点。”^①他从总结中国经验的角度，阐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与使命，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②他从东方大国的国情与使命的角度，分析了独立自主原则在我们党和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可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不同角度分析和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第一，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大国的国情和使命，决定了中国不仅要走自己的路，而且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第三，独立自主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

经过建国以后 60 多年的探索，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体现“独立自主”原则的经济发展框架。其主要内容，一是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经过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和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到 1978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645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1028 亿元，第二产业 1745 亿元，第三产业 872 亿元，呈现出“二、一、三”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3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88019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55322 亿元，第二产业 256810 亿元，第三产业 275887 亿元，开始呈现“三、二、一”的现代产业结构。同时，在产业布局上，通过建设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区和产业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内经济循环系统。二是建立了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总体目标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主席认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萧国亮、隋福民，2011）从 1952 年到 1958 年，中国工业发展的实际增长率为 18%，建成了一批国家工业化急需的基础工业，使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提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改革开放后加快了工业现代化步伐，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石油加工、化工、机械、建材、轻纺、食品、医药等工业部门迅速壮大，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等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2006 年的工业增加值达到 103720 亿元，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为 47.95%。目前，已经形成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的现代工业体系。三是形成了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科学技术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现代化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始终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科学技术体系较为完备、科学技术队伍庞大、科学技术成果丰硕的科学技术大国，农业科技、工业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2015 年，中国研发人员数量居世界首位，研发经费居世界第二，国际专利数量居世界第三。我国不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而且整体科技水平走在发展中国家前沿，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具有领跑的能力。

2. 经济分权的改革道路。所谓“经济分权”，就是指国家经济治理实行“分权模式”，将统一管理和分散管理相结合，寻求适合国情的改革道路。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基本特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管理的范围过大，规模庞大的组织结构使管理效率受到负面影响，适宜“分权治理”的模式（欧阳峣，2014）；通过合理设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灵活自主地处理辖区内的事务，有利于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管理效率。显然，经济分权的改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1—372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 页。

革道路,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有效途径,也是符合大国国情的改革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为适应经济赶超战略,沿用战争时期的做法和模仿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系,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过于集中的管理弊端,企业成为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地方财权非常有限,农民缺乏生产自主权,从而压抑了农民、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为此,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经济分权的思路,他强调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①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设计了一种国家管理企业的模式,“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经济模式,即在保持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对企业供销关系的计划管理的条件下,给予企业在日常决策上的自主权。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自1958年开始实行,其主要内容包括下放计划权、企业管理权、物资分配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财政权、税收权和劳动管理权。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是决定国家制度构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大致经历了五次反复:新中国成立初期效仿苏联模式,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系;1951年开始调整,实行财政收入分成和预算分级管理;1958年鼓励地方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实行分权化财政体系;1959年至1967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度”的财政体系;1968年开始实行集权模式,但是又在不断进行小的调整。从1978年开始,财政分权的改革方向基本明确,邓小平指出:“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大自主权。”^②他结合中国的大国特征,阐述了赋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更多自主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还具体分析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即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从而确定各自的收入范围,其实质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权,它使中央和地方关系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框架。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对现行的财政体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习近平指出:“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③通过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性适应的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长期探索,党和国家在经济分权改革道路上形成了系统的思想和政策:第一,经济分权改革是大国经济治理的必然选择,它是由庞大的国家规模及其复杂情况所决定的;第二,经济分权改革是系统工程,主要包括给地方分权、给企业分权和给农民分权;第三,经济分权改革的核心是财政分权,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科学的财税体制。

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分权改革始于1978年,通过给农民自主权、给企业自主权和给地方自主权的改革,探索了一条适应大国经济发展的道路。(1)通过农业体制改革,真正给农民自主权。为解决农业劳动激励机制缺乏的问题,中国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改革首先源于农村基层群众的创新,由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导致政府导向的强制性制度变迁。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提出: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划办法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穷落后的地区。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广,而且在国营农场推广,被称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中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从大集体的生产组织形式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实现了农业微观经营机制的转变;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并获得了生产剩余的支配权,从而形成一种经济激励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在1978—1984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增长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23%和6.05%,这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增长最快的时期。(2)通过企业体制改革,真正给企业自主权。为解决企业激励机制缺失的问题,中国城市调整了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关系,通过赋予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增强了经济激励和企业活力。根据林毅夫的研究,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1984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向企业“放权让利”,提高企业效率;1985—1986年为第二阶段,主要是“简政放权”和“改革税制”,增强企业活力;1987—1995年为第三阶段,主要是实行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责任制,重建企业经营机制。通过改革赋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制度。到2001年底,全国86%的国有工业企业完成了改制。这种企业微观经营机制的转变,实质上就是赋予企业在生产、销售、分配等方面的权力。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提出了建立“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3)通过财政体制改革,真正给地方自主权。为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缺失的问题,我国不断地调整国家和地方的利益关系;真正的财政分权改革是从1977年在四川和江苏进行财政包干制度试点开始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实行总额分成、收入递增包干、定额上解、上解额递增包干和定额补助政策。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资源税和特种消费税为中央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农业税为地方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为共享税。这次改革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使中央和地方构建了长期稳定的利益关系格局。这种分权改革的实质是赋予地方政权在财政上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分税制在改革实践中逐渐完善,建立了财政转移支付的机制,保障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3. 融入世界的开放道路。所谓“融入世界”,就是把本国经济看作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际范围内利用资源和市场,寻求适合国情的开放道路。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拥有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的优势,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就可以支撑产业成长,形成专业化优势。在封闭的世界里,大国的内源发展机制有着小国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小国可以利用国际的资源和市场形成推进经济繁荣的机制。因此,假如大国仍然自我封闭,就将丧失原来高于小国的优势,固有的规模优势可能被小国依托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超越;大国只有自觉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才能形成超越于小国之上的规模优势。事实证明,融入世界的开放道路是大国经济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的恢复。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赴苏联访问,他在莫斯科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①但是,西方国家试图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周围形成“新月形”的包围圈。20世纪60年代中国同苏联签订援助协定,又因政治关系的恶化而停止。进入70年代,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地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并将对外贸易和技术引进的重点转向西方国家。毛泽东指出:“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武力,1999)然而,从总体上看,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曾经长期处在一种“半封闭”的状态。邓小平指出:“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②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国将对外开放确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开始大规模地开展对外经济交流,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习近平强调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同时,提出了两项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一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二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习近平提出:“中国愿秉持共商、共构、共享原则,以‘一带一路’沿线各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8页。

国发展规划对接为基础,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以金融互利合作为重要保障,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努力开创“一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① 我们对融入世界的认识逐步增强和深化,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经济开放思想:其一,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只有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二,开放应该是双向的和多元的,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其三,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开放战略和政策,探索了一条融入世界经济的开放道路。(1)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发挥开放试验场的作用。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对外开放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行,我们的法则就是先行试验。198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1988年增设海南经济特区。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国内的特区集中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进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试验,为全国的开放积累经验。经济特区在决策上有更多的自主权,在政策上有更多的特殊性,包括引资和财税方面的优惠,有利于较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较短的时间里,特区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特别是深圳特区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创造了“深圳速度”的奇迹。从1980年到1999年,深圳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31.2%,出口年增长率达到42%。从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经济特区积累了经验,为全国的经济开发提供了示范。(2)通过开放沿海城市,带动全国的经济开放。在经济特区产生积极效应后,我国政府决定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即开放一批沿海城市,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主要目的是利用这些沿海城市交通便利,较早同外国发生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品经济和科技文化比较发达的优势,通过放宽经济政策和改革管理体制,增强对外经济的活力。这些沿海城市和经济开放区,分布在从南到北的沿海岸线边缘地区,形成一条狭长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不仅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而且带动了其他地方的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合作,促进了全国的经济开放、观念更新和体制创新。(3)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世界经济。1978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推动对外开放的政策,从总体上看带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特征,为使对外开放保持长期稳定,需要走向制度性开放,即与国际通行的制度规范接轨,以系统的和稳定的法律制度为对外开放提供制度保障。2001年12月,在经历15年的艰辛谈判之后,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世贸组织的要求,我国政府承诺: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并逐步使我国的市场开放达到世界市场开放的程度。这种承诺的积极效应在于,既有利于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又有利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迎来了全面开放的时代,开放的重点从制造业开放扩大到服务业开放,形成贸易、分销、物流、金融、通信、旅游、运输等服务领域的开放格局,同时还推动了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4)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开放合作模式。党的十八大以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制定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措施,通过以点带面和以线到片,开展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具体的做法有: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推动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通过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波斯湾—地中海经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把欧亚走廊的经济效应辐射到南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

4. 创新驱动的转型道路。所谓“创新驱动”,就是把创新看作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量,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寻求适合国情的转型道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大国,拥有比较丰富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4页。

的创新资源,可以依靠国内人力资源和技术市场推动创新和研发,形成大国创新优势(欧阳峣,2014)。后发大国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从粗放型增长开始的,主要依靠大量投入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资金推动经济增长,其特征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相应的低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期,需要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技术需求旺盛和技术市场规模庞大的优势,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的力度,通过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可见,创新驱动的转型道路是后发大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还在进行技术方面由手工业生产到大工业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①显然,在这里把技术革命、制度革命和技术创新提到同等重要的程度,阐述了在社会革命成功之后开展技术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愈益提升,邓小平适应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认为科学技术通过高科技产业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习近平从大国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论述了科技创新的作用,首先,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一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②他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科技进步和国家强盛的紧密联系,“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技术。”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其实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③其次,他分析了大国加快科技创新的极端重要性,“现在,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十亿人左右,而我国有十三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部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④最后,他分析了实行创新驱动战略的客观必然性,“过去30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上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如果现在仍利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⑤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努力奋斗,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特别是着力推动工程技术创新,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党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科技创新思想:其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二,大国拥有比小国更好的创新资源和更强的创新压力,科技创新是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其三,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走向高端;其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体制机制等方面来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充分发挥它推动经济建设的功能;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注重科学技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通过科技进步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逐步探索了一条创新驱动的转型道路。(1)实施“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的大国战略。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国家振兴的手段和基础,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强调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科技大国,从1995年到2015年,中国的专利授权数量从43741件增加到1718192件;研发经费支出从302.36亿元增加到14169.88亿元;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从13.4万篇增加到164万篇;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例从6.78%增加到28.82%。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繁荣,2015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5页。

^{②③④⑤}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0、23、28、35页。

列,对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分别跃居世界第1位和第2位。(2)在模仿创新基础上走自主创新道路。为了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模仿创新”作为主要创新方式,大规模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外商投资办企业,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扩散效应,进行工业技术的模仿与创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崛起。1985—2005年,中国引进外国技术总额从93.93亿元增加到1559.95亿元,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从57.44亿元增加到4941.64亿元。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基于大而不强的问题,我国提出走“自主创新”道路,实现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通过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在高铁技术、航天技术等方面赶上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3)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摆脱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利地位,适时地转变创新方式,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逐步提升我国重点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层次,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益明显,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高速增长,大多数省市的技术进步呈高速增长趋势,成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4)构建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科技创新机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了科技改革的步伐,努力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是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二是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深化改革,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基础,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积极作为,确定总体技术方向和路线,组织关键核心技术的联合攻关。中国高铁技术从集成创新走向自主创新,不仅用最快的速度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而且推动了产业发展,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上都领跑国际先进技术,成为政府科学组织和协调重大领域技术创新的成功案例。

三、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必然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它不仅正在以其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实力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而且将以其积极的形象和发展经验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同时积累了积极的经验,认真分析中国的发展道路,总结成功的经验,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发挥它在加快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也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历史使命。中国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也是适合大国特征的发展道路和转型道路,它对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具体地说,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大国提供了一种崛起道路和治理方式,也为世界文明提供了一种新理念和新力量,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鲜活实践经验。

第一,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大国提供了成功崛起道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客观地存在着统一性与多样性,人类主体与民族主体的关系,各个民族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形成的“发展模式”,是基于它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同现代文明的关系而获得实际内容和具体规定的。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①各个民族都受到世界历史整体系统的影响,成为构成世界历史整体运动的要素,并且因为同世界历史整体运动方向的契合程度,而形成自己的特定地位。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以后,任何一种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技术、管理、制度或文化领域的发明创造,无论是哪个民族提出和首创的,通过普遍交往将变成人类的共同财富,为各个民族选择或者享用。首先,世界现代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②在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将会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和具体历史条件,选择适宜于自身发展的道路或者模式。其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做出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的选择，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道路。从总体上看，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在探索实现现代化和跻身现代文明国家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人民在通过比较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之后，在艰辛的探索中做出了选择，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目前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愈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再次，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特征进行选择。中国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正在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追赶者，而且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引领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及国际矛盾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肯尼迪政府学院约瑟夫·奈教授认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范例，甚至是另一种现代化道路；英国思想家乔舒亚·库玻·雷默指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样的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唐晓，2010）。中国人民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建设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的国家，应该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二，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大国提供了适宜治理方式。经济治理模式是受国家规模、经济体制、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等制约的，中国政府从中国的大国特征和基本国情出发，创造了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有的学者将它称为“适宜制度”。中国道路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保障经济活力和社会公正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和经验，有的主要适宜于发展中大国，也有的可以适宜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比如，经济分权的治理模式，是适应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和土地辽阔的基本特征，为了解决管理幅度过宽和矛盾复杂的问题而形成的，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国治理模式，可以为发展中大国所借鉴。然而，具体怎样实行经济分权，各国应该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以及权力集中状况的不同而选择切实可行的方法。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是针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和机制不健全而提出的，它适应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客观情况，也适应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调控缺位的客观要求，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中期，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就强调发挥政府强力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强调计划管理和计划指导的办法。当时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刚刚取得独立，为了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和发展，需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因而更多地需要借助政府力量的推动。然而，这种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弊端，形成了僵化的和缺乏活力的管理体制，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低，经济上没有获得繁荣和发展。现实的经验迫使人们进行反省，导致了新古典主义复兴，强调以自由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市场体制既适合于发达国家，也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或者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使两种手段协调配合和相得益彰。为此，发展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希望学习中国这种重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共生演化关系的治理思路，中国的经验的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的选择。

第三，中国道路为构建新国际秩序提供了强劲推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逐渐形成了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重点的格局；20世纪末期，苏联及以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解体，美国重返它在全球经济和战略事务中的支配地位，世界经济格局由两极走向单极。进入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经济上呈现群体性崛起的态势，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的变化。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06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7%，新兴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5.2%，特别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国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典型代表，创造了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经济学家拉莫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

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唐晓,2010)。中国道路将带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新兴大国已经成为代表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社会力量,它们拥有大国优势,也肩负着大国责任,而且以积极的姿态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所有这些因素,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强劲动力。

第四,中国道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鲜活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我们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问题,深刻把握时代的脉络和走向,又要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吸取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从总体上说,中国发展历史正如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实验,经过近7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道路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可行的和成功的道路,中国经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中国道路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具体地说,一是新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怎样推动生产力发展?我们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比较全面地解决了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适应当代世界发展的大势,应该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二是新治理理念,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怎样组织这个自由人联合体?我们党提出中央和地方结合、政府和市场结合的治理理念,通过分级分权管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通过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这个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怎样促进经济开放发展?我们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主张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应站在全人类层面考虑自身利益,倡导“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这个理念的创新反映了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为全球经济开放提供了中国方案,应该纳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总之,总结这些鲜活的实践经验,必将给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 华民,2007:《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复旦学报》第5期。
- 林毅夫 蔡昉 李周,201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刘霞辉 张平 张晓晶,2008:《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陆铭等,2008:《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唐晓,2010:《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新华文摘》第10期。
- 王丹莉,2012:《“中国模式”研究之新动向与再认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
- 王新颖,2011:《奇迹的构建: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
- 吴敬琏,2014:《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
- 吴敬琏,2016:《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
- 武力,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 萧国亮 隋福民,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 欧阳峣,2014:《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姚洋,2011:《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军,2005:《中国经济发展:为增长而竞争》,《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
- 张平 赵志君,2007:《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大国效应与模式转变》,《财贸经济》第1期。
- 郑永年,2016:《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中信出版集团。
- 周弘,2009:《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责任编辑:谭 易)

(校对:孙志超)